



SHJ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本土

情怀

外景

未来



九十年代
九十年

学人批评文

吴重庆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SHU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包亚明 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土 情怀

吴重庆 著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殷卫星
装帧设计 王月琴

本土情怀

吴重庆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6.7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170 插页 2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4 月第 1 次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604-5 / G·589

定价: 12.00 元



吴重庆

吴重庆，男，1964年生于福建莆田。199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出版博士毕业论文《儒道互补》（广东人民出版社）和随笔集《穿越斑马线》（海天出版社），随后创办《岭南文化时报》。近年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本土诠释和农村问题，有数十篇专业论文和时评发表。现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兼任《岭南文化时报》总编辑。

丛书策划：唐继无

责任编辑：殷卫星

封面设计：王月琴

责任出版：晏恒全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1
● 文化立场	1
● 共同经验	1
● 知识传统	1
● 代际差异	1
 传统中国的精神空间	13
道德重建如何可能	15
此在的乐园	22
儒道互补	26
从穷理、循理到推理	42
“天人系统”的功能	51
随适的自为、自性	56
人欲关天	61
 在“化外之地”	65
“化外之地”的心内革命	67
“化外”文化的定位	71

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	73
一个南方乡村的往昔岁月	77
岭南地理与道教传播	93
给粤人画像	102

洗滌语词 112

客气	得意	天经地义
当然	放心	出生入死
气质	因为	麻木不仁
气象	卫生	理直气壮
随时	精神	通情达理
知道	真诚	心安理得
反复	虚心	理所当然
道德	风流	目空一切
推理	作业	来龙去脉

日常观察 167

向陈寅恪先生学习什么	169
千有一用是书生	173
道德建设非儿戏	176
德育的错位	178
“咸湿”	180
“排污”先肃内	182
抵制文化霸权	184
检视文明现状	186
科技之用有禁区	188
寻觅文化中国	190

有家难归	192
客厅的意义	194
无力谈情说爱	197
公众人物的隐私	199
 代后记:从边缘到边缘	 201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孔子说：“三十而立。”“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属“而立”之年。照我对孔子的理解，这个“立”的含义，并非时人所谓的“建功立业”，而是指确立责任、订立规矩，这也是儒家视野里的“成人”标志。“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规矩是什么，大概可以从“我们”所持的文化立场上体现出来。

现代人文知识分子需确立的职志有两：一是在学术专业领域为积累和创新作贡献；二是参与社会，向大众发言，把文明的

价值取向传播给大众,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为大众提供别一种观察、反思日常生活的立场和角度。

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标准化的学者生活应是坐稳十年冷板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之所以提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需确立如上所述的第二种职志,因其亦关乎文明之脉的传承与维系。目前,大众流行文化的泛滥已营造了一个抽空文化内涵的环境,把大众日益塑造成“单向度的人”——精神空间褊狭、历史意识淡薄、个性萎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的兴亡,人文知识分子应理所当然地负起责任。王船山说:“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如今,某些人文知识分子正逐渐被商业机制收容、整合、改编而放弃了自身的立场,或者热衷于自言自语、党同伐异。在此,我从内心里认同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的愤激之言——“叹息这一代游离‘知识分子’普遍的懵懂、无耻及低能!”

随着开放的世俗社会的形成,多元文化观念并存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确立,自由思想的空间扩大了。在“左倾”教条时代结束之后的今天,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宽松”的文化环境。

“左倾”教条时代的结束本来使大众脱下了“枷锁”,但在流行文化无节制泛滥的今天,大众又心甘情愿地钻进了“牢笼”。这个“牢笼”貌似自由——爱怎么玩怎么闹都行,而问题是大众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预设认识,即凡是流行的都是理所当然乐此不疲去追逐的,这从根本上扼制了大众在世俗生活中所应享有的自由,他们义无反顾地葬送了自由选择、自由鉴赏、自由想象的可能性和机会。这是人类精神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严重障碍!

我并不笼统地排斥流行文化,但我坚决抵制它在大众精神空间中的一元化趋势和霸权地位。当我面对着大众放弃思考、丧

失判断能力地狂热认同、拥抱流行文化所制造的一系列虚假符号和标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令人震惊的非理性行为时，只能以他们内心深处的“法西斯主义”情结在作祟来解释。

面对此种情况，我并不寄望于大众的自觉，而宁愿恳请人文知识分子努力负起责任，用我们的创造性工作，切实抵制流行文化的一元化和霸权倾向，重新建立多元化的精神空间和文化格局，促进并从事精神世界的所有探索、历险活动。

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内容决定了他往往是单兵作战。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一个人只能做某一门类、某一领域里的极有限的工作。在行动之前，首先认清自己的局限性，然后才能真正做到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保障，此即所谓“从我做起”的积极意义。在社会转型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目前的所谓“社会分工”并没有带来更广泛的深入合作，但这远不能成为放弃个人尽职的理由！我们须认识到自身有限努力的价值所在，我们所营建的精神空间即使狭小，但毕竟是多元中的一元，毕竟可以为世俗提供参照，为大众提供想象，对反文化现象作出应有的抵制和批判，对大众流行文化的霸权格局作出抗衡的姿态。“星星之火”不妨点上，“可以燎原”则是一种期待，一段努力。

我的专业领域为中国古代哲学，起码就我而言，上述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两种职志是相辅并行的，因为流行文化的猖獗与本土文化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犹如阳气亏空必致虚火旺盛，所以，致力于本土文化的阐释抉发，也是尽责抵制流行文化肆意侵吞精神空间的表现。而我对本土文化的强烈关注，乃有感于其在流行文化重兵压境下节节败退的事实。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蔡志忠把中国典籍漫画化的一系列“小人书”风靡大陆，之后更有许多主观随意乃至歪曲的“白

话××经”出笼，这些貌似弘扬传统本土文化的举措，事实上透露出—个令人伤感的强烈信息，即传统本土文化在向大众流行文化称臣，其内容的简易实用、制作的“快餐化”及娱人的目的，无不显现大众流行文化的嘴脸。

“小人书”的畅销，自然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资源的匮乏和大众文化素质的平庸；而当皇皇巨著被百般趋俗地“白话”和“今译”时，我感叹文化的传承者们没有权利慷慨地把一流的东西当做二三流的货色削价应市。“小人书”和“白话今译”其实只给大众平庸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些许笑料。时下舆论呼吁杜绝“国有资产”流失，但未见舆论呼吁警惕传统文化资源日趋—日的严重流失。在此，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有人与我—道，共同来对待—个问题：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有效的本土阐释，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公共资源。

1992年，我在《儒道互补》—书的“后记”里说道：“本书使用—些具‘中国特色’的表述，如‘通道说’、‘明镜说’、‘天成秩序’、‘因为’等，这也许在无意中呼应了人文学科的‘本土化’运动。”想不到当初的“无意”变成了现在的“自觉”，这种“自觉”的意念，完全是个人化的，我并—想提倡或号召什么“本土化”运动，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毕竟也极需要有人做现代性的阐述，以期与西方哲学对话交流，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成为人类的精神资源。不过，如上所述，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个人工作的有限性或局部意义，我所欲努力的所谓“本土阐释”，不过是为了方便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智慧的接受。

以唯物、唯心的阵营划分和“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的机械剪裁去对待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早已被学界公认为陈旧的“研究”方法，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意识到，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作为打开中国传统哲学宝库的钥匙不也会导致中国传统哲学的

失真吗?当然对这一问题不能绝对化,因为我们日常的大量用语都是在近代从西方输入的,我不是说不能借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而只是强调建立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阐释框架和系列关键概念,这样既可以防止中国传统哲学在被阐释过程中的失真,也会更契合中国人的情怀。譬如,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大全”之体蕴含万物,但具体物之间并不发生联系,而是每一具体物直接与“大全”发生联系。这一情形,就远不是“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等西方哲学概念所能说明,而与中国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念倒是相吻合。我个人极希望从有系统地提炼、概括中国传统哲学的关键概念开始,来一次观念上的沐浴清洗,荡涤“西化”的层积,审慎地使用概念,写出一部同样可有效传播的、便于进入公共文化精神空间的、简明地道的中国哲学史,而非虽为中国人撰写、但以西方哲学理念观照的中国哲学史。老实说,我的这一努力方向也许是出于取巧,因为我的西学功底薄之又薄,所以我得再次声明:本人绝无轻视学界同仁的别种探索之意。

本土情怀促使我更多地以中国为出发点,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关心中国自身的问题。这是我在专业研究之余,把兴趣投在中国农村调查的动机所在。

1995年初夏,在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与同事一道前往地处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农村,进行为期近半年的题为“经济发展与农村人文环境变迁”的系列调查。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感受、接触、记录中国农村的传统人文资源,但结果却令我大为失望:起码在经济发达的当代农村,都市里单一化、平面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全面降临,传统人文资源已经被商业机制榨挤殆尽。失望之余,我有一种重建农村生活形态的迫切感。这话的意思并非指我希望农民安贫乐道、固守土地,而是指若以都市里的生活方

式去指导在占绝大部分面积的国土上生息的八亿农民未来新生活的话,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是严重的。如在都市生活方式的指导下,为填满都市化的消费欲望而需要的大量物质资源供给将严重超过资源再生的极限,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句空话。而事实上,都市化的消费欲望有许多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精美动人广告的引诱,它根本就不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的真实需要,而正是这些虚拟的消费欲望,从一个大国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言,是应该有步骤地加以阶段性限制的;又如,哪怕在完全法治的环境里,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道德规范约束仍不失为社会控制的重要一极;再如,农村民俗活动的式微,带来农民自娱活动的扩张,在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的农民那里,自娱活动难免沦为越轨行为。

重建农村生活形态从大处讲,关乎国计民生;从小处讲,关乎人文发达。农村在生活形态上的都市化,必然是以抛弃传统人文资源为代价的(况且如上所述,这种代价的付出纯属无谓)。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自然不愿看到这种结局,不愿看到将导致人类精神进化阻滞的流行文化扫荡中国的每一角落,形成坚不可摧的一元化统治。正是在此意义上,我理解梁漱溟先生再三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三四十年代大批放洋归国的有为社会学家何以热衷于农村调查和社区研究。

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的热潮有一些主客观因素使然。时逢战乱,知识分子在城市里的位置及角色担当都难以确切寻找到,另由于“二战”的爆发,相当多的人认定中国走西方都市工业文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而客观上,当时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生活提供了接触农村的机会。“时过”但“境”未必全迁,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已习惯了都市蜗居生活,在喧嚣的商业大都会里其实成了“边缘人”,他们是否也应该再到农村去?是

否不要认定城市才是自己的应有天地和舞台？不要把城市生活视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化生活，不要以“准殖民”的眼光和心态去搜寻所谓“标准化生活”之外的奇风异俗，这样，我们便会对中国的农村多一份同情的理解和切身的责任。吴文藻先生在1935年曾说，知识分子开展社区研究，“虽不能直接帮助问题的解决，至少可以促进问题的正当认识，暗示解决的正当途径”。重建农村生活形态，需要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其所产生的作用即在于此。

退一步说，中国当代农村正遭遇数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局，今天的变化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尤烈，从抢救本土文化资源的角度言，也需要我们及时去观察、记录、整理，需要我们及时去采风问俗，为后人留下本土文化的第一手材料。这也许是在我们无力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提出具体建设性意见之际，依然可做的一项无愧于中国农村未来的工作。

农村是传统本土文化得以延续的庞大根系所在，关注农村，重建农村生活形态，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多元化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努力显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但正因此，才与“上一个学术代”构成差异。这“上一个学术代”指的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不一定是生于50年代学人，也可能是生于40年代学人。他们的成长经历大抵相同，即10年“文革”正好是他们勃动的青春期，与挫折磨难相伴随的对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深沉思考，需要表述与抒发。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他们中的精英，是带着上述思考跨进大学校门的，他们的学术活动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烙印。80年代的中国社会，涌动着不断高涨的改革热潮，知识精英们大都选择文化激进主义的策略，把激情诉诸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此，学术活动的背后寄寓着救世热

情。他们借助于学术，试图对各种社会问题都发表看法。他们的功绩是给人们开启了许多新视角，但在学术规范、学术积累上，难免未尽人意（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学术事业上的成功者）。

生于 60 年代学人的成长经历简单，更倾向于把学术活动确立为一种中性的职业活动，由生于 60 年代学人操办的《原学》，即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另外，与上一代学人积极引进西学相比，生于 60 年代学人愿意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问题，关注国学，企图与 1949 年以前的国学大师们接上联系，缅怀“旧人旧事”。所以，与现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在 80 年代红极一时相对的是国学大师的传记在 90 年代争相传阅的盛况。我把生于 60 年代学人的这一进取方向视为他们欲在 90 年代寻找自身角色位置的努力。在大批同龄人“下海”经商并非想象中顺利的遭遇下，在中国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密发达的趋势下，生于 60 年代学人自然必须考虑“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的问题。加上中国社会的逐步正常发展，那些被狂热政治运动的油彩所遮蔽的、被重大社会变故的波澜所淹没的而在正常的社会运作过程中又必然要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便纷纷凸现于这一年代学人面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关注中国自身社会问题的客观原因。所以，生于 60 年代学人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准确地说，生于 60 年代学人是把“窗外事”拿到“窗内”来，以社会科学的立场、知识，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揭示，既无笔底波澜，亦非语中惊雷，但其意见或观点，可能更具建设性。我希望生于 60 年代学人能负起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进步的重任，这样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生于 60 年代学人可能一直在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影响中国一代人命运的 10 年“文革”，“我们”与之擦肩而

过，至多只保留些许依稀印象，谈不上是“见证者”，更无资格参与，属于“门外”瞧热闹的看客。

盛极一时的 80 年代“文化热”期间，“我们”可能还在读书或刚刚跨出校门。凭“我们”当时的学识，无力成为“文化热”中的核心人物，但受当时风气的感染，亦曾如孩童般加入这场盛大的思想狂欢运动，大而无当、毫无学理根据地把中西文化比较一番。上前台，“我们”轮不到，只好在幕后随着鼓点起哄，私下的热烈辩论，事实上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肯定和相互砥砺，确立“我们”的信念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意识。“我们”事实上是一帮身处边缘而又不甘边缘的人。

在南海潮涌的 90 年代，生于 60 年代学人选择在岸边看海，这是“我们”第一次自主自愿地远离社会热潮的中心。在社会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并且利益至上成为整合社会运作的原则时，这种选择意味着“我们”永远自甘边缘，意味着对以学术为终身职业的学人角色的认定。

从生于 60 年代学人至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社会热潮看，“我们”基本上都处边缘的位置，正因此而无明显的受挫经历。“我们”并无索回青春的要求，从而多了一种“从我做起”的决心；并无抨击不公的愤慨（因为选择学术活动是“我们”自愿的），从而多了一份“回报”的信念。

就我自己而言，有一些简单朴素的信念在不断支持、鼓励着我的“边缘人”的工作。

从待启蒙的孩童至今，作为一个接受文明教育的学生，我单方面地只有吸纳没有回报地享用了先人的智慧、思想，尤其是当我意识到已故的文化大师们至今仍以其所创造的精细的文化成品滋养着我们今日的粗糙生活时，我的愧疚心理和感恩意识就会萦绕胸怀。假定社会的大环境暂不需要一种文化氛围的时候，